东洋史学与日本汉学关系概述 *

□ 赵　薇

摘　要：日本东洋史学不是日本汉学，也不是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自然发展阶段。日本学界努力归入东洋学体系的明治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实际至少包含了“东洋学”与“支那学”两条线索，而东洋史学是东洋学的主要内容。从学科、学会、学报和学派视角建立的基础认知出发，可以看到日本东洋史学是一种从支撑框架到讨论方法再到研究立场上全新的中国历史文化观察系统。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上，日本东洋史学与“支那学”思维一致，同时包含了明确的文化甚至政治诉求。

关键词：东洋史学；日本汉学；“支那学”

中图分类号：K091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23.02.017

日本东洋史学最初设定的研究地域是与“西洋”相对应的“东洋”，其实际研究范围以汉文化圈为主体，尤其侧重中国边塞史、民族史研究。以日本近代学制改革为参照作点式观察，日本东洋史学的生成体现国家意志的同时，也显示了思想文化运行发展的内在惯性；但还原到日本汉学即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线性轨迹中，其学术研究配合国家扩张政策的政治工具属性更为突出。本文以这一认知为基础，主要围绕学科、学会、学报和学派等日本东洋史学显性标志，对东洋史学与日本汉学关系做概述性讨论。

一、问题的缘起：近代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存在状态

讨论东洋史学与日本汉学关系，主要考虑：如何准确定位明治到二战结束阶段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学术史的书写基调，对国内相关研究中模糊日本东洋史学根本性质的现象做出提示。

基于以上目标，首先要解决一个既是学术史书写立足点，也与本文立论相关的问题。上述表达中隐含了一种认识，即认可日本汉学与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等同性，而实际这是颇为棘手的问题。学理讨论之外，学术史书写中的两种观点：严绍璗主张“把19世纪后期以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作为‘汉学研究’……把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归为‘中国学’研究”[①]，李庆则以“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的日本近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之学”为“汉学”或“近代汉学”。[②]前者从研究对象出发，后者从研究自身出发，两种认知并无可比性，但问题是“汉学”和“中国学”两种学术史命名已上升到实践层面。本文认可日本汉学与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等同性：学术史强调延续性，本身即是追根溯源的工作，如果撰写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通史，只能以“汉学”命名；日本将二战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称为“中国学”，着眼于研究对象侧重点的变化，只是一个增量问题；试图通过对西方词语的“训诂”解决“汉学”或“中国学”命名，实有舍本逐末之嫌，“汉学”与“（中国）国学”构成闭合系统，命名才有意义与价值；以“中国学”代替“汉学”，在实际书写中极难做到统一，如葛兆光先生《域外中国学十论》中表述“汉学”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东洋史学的生成机制与实证方法研究”（项目批准号：19BSS05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5页。

② 李庆：《日本汉学史·前言》（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学”的不断转换；张西平先生指出：“语言的特质之一就是‘约定俗成’，不必在学科的名称上长期争论。”[①] 学科建设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话语体系，可以“约定”，而重视“史”就必然重视“俗成”。以上是学术史书写意义上的命名认知。

其次看明治到二战结束前日本汉学的存在状态。户川芳郎在为《日本中国学之发展》所作“卷头语”中，将明治以后日本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分为两个系列：一是汉学、“支那学”与中国学；二是东洋史与东洋学、东方学，并进行了简要说明。[②] 户川指出了明治以后日本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学术术语或关键词，但其划分与解释存在一定错位和避重就轻的情况。可从梳理这些关键词中，厘清明治到二战结束前日本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存在状态。其一，户川的划分包含了二战后直至当代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部分，“中国学”在日本是一个晚出的概念；日本明治时期的“东方学”只是“东洋学”的一个铺垫，与目前的日本“东方学”研究有明显区别。所以，描述明治到二战结束前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状态，可先将户川的两个系统调整为：汉学、“支那学”；东方学、东洋史与东洋学。其二，户川指出了“东方学、东洋史与东洋学”对研究对象持有的批判性立场，但另一系统中的“支那学”也包含了对研究对象即中国的“批判性”。而且，日本建设“东洋伦理”所凭依的“中国文明”实际是更早的日本“儒学”，户川的这部分解读所指对象更接近日本的“国学”。其三，认为东洋史与东洋学仅仅是对研究对象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指出两个系统“都是站在民族利害的立场上进行研究的”也基本属于因无可厚非而无关紧要的反思。其四，户川划分的两个系统不是完全平行存在的，日本包括东洋史学在内的东洋学产生，“支那学”的发展，都受源于西方“东方学”的影响，但其研究根基仍在日本传统汉学，两者的存在时间和研究立场等都有交集。为此，对明治到二战结束前日本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存在状态可简述为：明治之前，以儒学为核心的日本传统汉学和以汉学为基础的日本国学共同组成的学术思想体系因为认知角度转变等而发生改变，[③] 日本传统汉学开启“支那学”阶段，二者并存；明治以后，创建了“东洋学”体系，存在于日本国学中的汉学成分在体制内以“古典讲习”形式存在，汉学在（帝国）大学被拆解为“支那”史学、“支那”文学和“支那”哲学，以“支那学会”和《支那学》杂志为标志的“支那学”在帝国大学重新整合；明治到二战结束前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基本状态则呈现为，东洋学与“支那学”交织共在，而东洋学以东洋史学为主体。

最后看国内相关研究提示意义上区分日本东洋史学与汉学的必要性。日本东洋史学的建立与引进西方学制相关，包含有与“西洋史”分庭抗礼的意味。同时，日本东洋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或汉文化圈）。基于这些表象，日本学界努力将东洋史学描述成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中心的纯学术研究，中国学界对此的表述也较为模糊。具体表现为：客观上将其纳入日本汉学研究的自然发展阶段，批判性分析不足；资料文献译介过程中从自我保护出发，主动屏蔽或替换关键词；用局部研究观点代替全面认知，以量代质定位个别史学家。这一方面是史学史研究本身的缺憾，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相关研究尤其是涉及民族、边疆史的研究中资料使用不当等问题。

二、推进的路径：日本东洋史学的“四学”观察视角

明确了为什么要讨论东洋史学与日本汉学的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从哪里着手讨论二者的关系，这涉及对日本东洋史学的定位或者说何为日本东洋史学这一基本命题。本文主要从学科、学会、学报和学派四个关键词出发进行讨论。

第一，学科是定位日本东洋史学性质的根本依据。日本东洋史学不是自然发展形成的，也不是后世学者的总结归纳，而是有明确规划的学科

① 张西平：《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序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年，第 4 页。

② 仓石武四郎讲述，杜轶文译：《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卷头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

③ 这一体系还应包括以“兰学”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等。同时，日本国学与佛教又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同样涉及汉学问题。此与本论题关联较小，有兴趣者可参考松本三之介的《国学的成立》等。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设计。“东洋”一词首次出现在学科中与哲学相关，1882 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增设了包括印度及中国哲学的东洋哲学，这可看作是日本东洋学的学科起点。“东洋史”一词在日本学界的最早使用者为冈本伴治，1874 年太田勘右卫门编辑的《新刻书目便览》中收录了冈本伴治的两卷本《东洋史略》。“东洋史学”概念的首倡者当推井上哲次郎，其 1891 年 11 月到 1892 年 1 月在“史学会”月例会上的演讲辑录成文《东洋史学的价值》。而具有学科意义即将历史学分为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使“东洋史”内涵外延更加明晰的是那珂通世（1851—1908），1894 年其提出这种区分规划，同年 7 月，这种区划出现在《高等师范学校校则》中。在“东洋史”概念逐步明晰的同时，作为课程的“东洋史”也开始进入日本高校，三浦梧楼主持的学习院于 1890 年开设“东洋诸国历史”课程，是日本东洋史学的课程起点。[①] 此后经那珂的规划及教材准备等，“东洋史”课程自 1897 年起在学校普遍设置。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日本东洋史学，则主要指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文科大学学者所做的东洋史研究。对日本东洋史学成为独立学科，日本学者大多将其作为一种既有存在加以陈述，回避其背后的因素，更有学者提出“把十九世纪初的‘支那学’成立作为东洋学成立的时期”[②] 这种混淆视听的表述。对此，陈玮芬指出：“东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分科出现是因应当时特有的时代状况下而产生的，换言之，它是伴随着近代日本的大陆侵略，为产生和普及一切与亚洲之过去与现在相关的知识而设立的。”[③] 同时，对作为学科的日本东洋史学，还应注意以下几点：这一学科设置方式受西方现代学科划分方法的影响，但更是以此为契机的一种对学术研究目标的规划，国家意志是决定因素；西洋史、东洋史和日本史的三分法，是当时代日本“脱亚”思想的反映与实践，更是以日本为中心的新亚洲观的建立；日本东洋史学作为学科沿用至今，观察研究对象的侧重点有所变化，但内在的话语逻辑和研究立场仍时有延续；东洋史学与“支那学”有交集，但这不说明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围大于“支那学”，相反，其只关注“治乱兴亡”。

第二，学会与学报提供了认知日本东洋史学价值取向的基础文本。学科建立的过程带有日本东洋史学的政治属性，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划定日本东洋史学的界限？显然，不能因为某人曾经做过东洋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从而认定其所有研究都属于东洋史学研究，也不能因为某人进行了中国以外其他亚洲国家历史的研究，就简单将其归入日本东洋史学范畴。日本东洋史学研究成果界定的复杂性，是目前相关学术史梳理中对其本质认知的主要障碍，比如，日本学界有人倾向于将这一时期的所有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都称为东洋学研究。[④] 为此，讨论日本东洋史学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文字材料：一是“经典”文本，尤其是当时普遍认可的东洋学文本，如《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二是教材，即各级学校东洋史学科教学使用的教材，如儿岛献吉郎的《东洋史纲》等；三是与东洋学相关的学会的演讲和学报发表的文章；四是“东方文化学院”所属两个研究所的史学论著。本文讨论的是第三方面即学会与学报的问题。具体而言，学会方面应重点关注成立于 1886 年的“东洋协会”，与此对应学报方面要重点关注《东洋时报》和《东洋学报》。而由于这两份学报创刊较晚，“史学会”创办的《史学杂志》[⑤] 中的部分文章应予重视。同时，1925 年创建于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

① 课程主讲者为刚刚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的白鸟库吉，详参内野敦的《白鸟库吉的历史教育》，载《学习院大学教职课程年报》第 3 号，2017 年 5 月。

② 详参青木富太郎：《东洋学的成立与发展》，东京：萤雪书院，1940 年，第 6 页。

③ 陈玮芬：《从东洋到东亚从儒教到儒学——以近代日本为镜鉴谈东亚儒学》，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4 年第 6 期，第 209 页。

④ 参见江上波夫：《东洋学谱系》，东京：大修馆，1992—1994 年；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⑤ 德国人里斯和重野安绎于 1889 年共同创办“史学会”，发行的《史学会杂志》于 1890 年 12 月更名为《史学杂志》，主旨在介绍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究会”与其《东洋史研究》杂志刊载的文章也是重要凭依。关于日本东洋史学相关学会的组建与学报的刊行，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不同学会和学报的组建运行，反映了日本东洋史学学科设立过程中性质的变化。如1886年由内藤正直等创办的“东洋学会”及出版的《东洋学会杂志》，其目标是建立与“西洋学”对立的“东洋学”。其二，即便是在东洋史学作为显学的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也并非唯一的声音，以中国古典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汉学和融入新的研究方法的现代汉学逐渐从学科设置中被剥离，但实质研究并未停止。其三，对待学会发表或学报刊发的文章，在具体讨论评价中要注意文章的系统性问题，包括此文章在作者整个学术历程中的位置与此文章在某种特定研究构想或学术论争中的功用。

第三，可借学派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廓清日本东洋史学的外延。这里所说的学派主要指向京都帝国大学。与学科的规划预设性和学会学报的既定存在性不同，学派是后人阐释解读的产物，这使得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从不同角度获得了不同的命名：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支那学派”。以地域得名的“京都学派”虽然在有些日本学者的表述中成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简称，但其实际内涵更加广泛，与本讨论关联更紧密的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支那学派”两种命名。笔者认为，对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以“京都支那学派”指称更为准确。一方面，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早期开展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涉及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较少。如前所引，青木富太郎混淆“支那学”与“东洋史学”的界限，但其同样看到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这所大学在明治40年末创立了史学研究会，第二年2月开始第一次活动，并于9月发行《史学研究会演讲集》第一册。演讲集中与‘支那史’相关的研究当然很多。”[①] 从青木的表述和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建立初期的研究成果看，其所从事的实际是“支那史”或者说融入了新立场、新方法的近代汉学研究。另一方面，以“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取代“京都支那学派”是战后日本学界试图以东洋学涵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阐释，江上波夫的《东洋学谱系》、窪寺紘一的《东洋学事始》等无不如此。而在国内接受层面，正如刘正所言：“事实上，最初用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者群体及其学术思想的术语正是‘京都支那学’……它的准确称号应该是‘京都支那学派’……但是，这个术语中出现了‘支那’二字，这也是‘京都支那学’或‘京都支那学派’不为中国学术界认可和接受的直接原因。”[②] 接受与否，与民族心理强大程度相关，但对此问题，首先要在学术史讨论中努力还原。

总之，我们同意以“京都支那学派”命名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并不是说该高校的学者从没进行过有关东洋史的讨论，也不是说其东洋史学科的设置与东京（帝国）大学有不同的目标，更不是说其在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与东洋史学有本质区别，这只是基于学术史的还原。

三、基础的认知：学术研究比附国家政策的汉学歧途

以学科、学会和学报为支撑的日本东洋史学实现了学术研究体系的现代化，在史观及史学方法等方面也展现了新的学风，但研究对象区划上的顶层设计谬误等，决定了其学术研究比附国家政策的政治工具属性。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其与日本汉学的关系。

第一，日本东洋史学科设置的过程，也是日本传统汉学研究体系在“体制”层面消解的过程。以儒学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汉学在明治以前已呈现衰落迹象，但此时的汉学至少还具有与“国学”“洋学”博弈的资格，而且，由于日本国学的特殊性，汉学在日本的国民教育系统中甚至仍占优势地位。日本传统汉学之所以边缘化，1872年“新学制”的颁行是源头上的釜底抽薪，具体到大学阶段则与“东洋学”研究体系形成息息相关。钱婉约认为，日本东洋学的确立，“标志着文化教

① 青木富太郎：《东洋学的成立与发展》，第151页。

② 刘正：《京都学派》，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育界和学术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古典的传统中国转向于现实的‘东洋世界’”。[①] 这种转向，并不只是日本学术研究自身的选择，而是由日本政策决定的，是基于国家意志的强行剥离与分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设立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1877 年。东京大学定名时，文学部分为两科：第一科是史学、哲学、政治学，第二科是和汉文学。其中的“史学”专指西洋史，不包括日本史和中国史，更不包括“东洋史”，并于两年后即被废止。须要注意的是，第二科“和汉文学”的主语是“和汉文”，涉及内容更接近日本国学；“古典讲习科”招收的两届学生学校没有为其颁发学位。第二阶段，1887 年至 1889 年。1887 年，东京（帝国）大学重新设置了史学科，内容同样只限西洋史；1888 年在课程中加入日本历史，此日本历史与前一年开设的和文学科中的“日本历史”并列存在；1889 年，东京（帝国）大学在史学科之外又设置了独立的“国史学科”。须要注意的是，“国史学科”的教学科目里除了日本历史外，还有史学和中国历史；此时的汉（文）学科虽然独立但并无学生。第三阶段，1904 年至 1910 年。1904 年 4 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原有学科统合为哲学、史学、文学三学科，在史学科目中设置国史学、“支那”史学和西洋史学。到 1910 年，其中的“支那史”正式更名为“东洋史”。须要注意的是，1904 年的学科改制中，此前无实际活动的汉学科被分为“支那”哲学、“支那”史学和“支那”文学，分别隶属于哲学科、史学科和文学科。相对于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创办时间稍晚，到 1906 年其文科大学成立时，即施行“哲、史、文”体制，开设了包括“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等的六个讲座，而属于史学科的“东洋史学第一讲座”于 1907 年才真正开始运行。总体上，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在命名上抢先了一步，这得益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相关积累，更是政策影响的明证，其东洋史学科的存在形态及环境，则与东京（帝国）大学有所不同。从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学科生成的过程可知汉学从一开始被排除在学科设置之外和遭受赤裸歧视的昙花一现，到其中的中国历史被置于“国史学科”之下，再到一分为三，而其中的“支那史”变为“东洋史”，呈现出了以内在思想发展为支撑、以外来学科划分标准为催化、以政治政策元素为主导的，“体制”层面上日本传统汉学研究体系的拆解。这种拆解包括学科自身、经史子集教育模式、注释与训诂等研究方法，是汉学元素的整体剥离。

第二，日本东洋史学构筑了从支撑框架到研究方法上全新的中国历史文化认知体系。按照那珂通世的设计，日本要建立的是与西洋史对应的东洋史，但实际上，日本东洋史学一方面与 1871 年日本废藩“使明治领导集团得以从对明治前社会结构的依赖中解放出来”[③] 一样，消解了原有研究体系，剥离了原有汉学元素；另一方面却并未达成与西洋的“对应”，重新建立的正是具有西洋背景的中国历史文化认知系统。这一系统包括研究支撑框架的构建、研究方法的借鉴、研究目标的设定乃至具体观念和观点的吸收等四个方面。其一，支撑框架的构建。学科以外，日本东洋史学主要依托日本“东洋协会”和“史学会”，涉及汉学的另有京都帝国大学的“支那学会”，传播途径则以《东洋时报》和《“支那”学》等杂志为主，支撑框架的构建取法于西方，具有现代意味。其二，研究方法方面。里斯带来“科学史学”的同时，对近代日本历史研究产生影响最大的本土方法论著作当属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而此书主体思想接近于德国人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顾仍西洋故言，无所表见”，此有公议。[④] 其三，研究目标。莫东寅认为：“所谓东洋史者，即以中国为中心，说明东方诸国治乱兴亡之大势，

①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7 页。

② 主要根据以下资料整理：白鸟库吉：《学习院史学科的沿革》，《白鸟库吉全集》第十卷，东京：岩波书店，1971 年，第 378—384 页；五井直弘：《近代日本与东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 年，第 30—56 页；滨寺纮一：《东洋学事始》，东京：平凡社，2009 年，第 189—224 页。

③ 韩东育：《明治前夜日本社会的体制阵痛》，载《日本学刊》2018 年第 6 期，第 154 页。

④ 详参李孝迁：《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载《史学月刊》2009 年第 2 期，第 100—101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西洋史对立，为世界史之一半。亦即亚细亚之综合的历史也。”[①] 此与1894年日本文部省公布的“普通中学各学科要领”中有关东洋史的表述基本一致，而“要领”进一步指出：“以往在中国历史里以历代的兴亡为主，没有说明人种的盛衰消长，在东洋历史中不仅要说明东洋诸国的兴亡，还要讲授支那种、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等人种的盛衰消长。”[②] 日本东洋史学以“治乱兴亡”为着眼点，关注以中国为地域核心的人种“盛衰消长”，在研究方向上受“东方学”的影响，其本身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其四，观点认识方面。日本东洋史学家很多具有西方教育背景，体现在课程讲授上与学术著述中。如白鸟库吉担任“汉文支那语学第三讲座”教授时，最初的讲座题目是《西人之关于中国的著述一斑》。为此日本东洋史学所搭建的支撑框架、所选取的研究方法和所预设的研究目标等与日本的传统汉学研究有本质的差别，这表面上体现了认知途径偏向于西方的变化，更深层次所隐含的则是研究立场的转变。

第三，日本东洋史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贬低与“支那学”思维一致，同时包含了更明确的文化甚至政治诉求。此处的“支那学”，包括京都帝国大学的“支那学”与此前以“支那”指代中国的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在研究立场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一是东洋学体系的建立；二是将中国作为“他者”进行讨论，其标志为以“支那”指称中国。江户时代是日本吸纳融合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之一，而当时的儒学、“国学”、兰学论争，已酝酿了日本在对待中国历史文化态度上的转变，此后陆续出现了以“支那”命名的“文明史学”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著作。津田左右吉认为：“儒者的学问显然不是真正的学术。所以，（如今）不使用汉学而使用支那学。支那学也把儒学作为研究对象，但与儒学不同的是其从自由的学术观点出发，进行解剖、分析与批判。研究支那的所有文化现象这一点是意见相同的。”[③]“支那学”改变了传统汉学的研究立场，是一种外在关照，但这从一开始就不是客观的。比如，国内学者关注到田口卯吉在《支那开化小史》文中，完全没有看到中国“开化”的丝毫迹象，看到的只是生活在黑暗“专制”腐败政治制度下的苦难大众，与其所作的《日本开化小史》比较，贬低的意味更加一目了然。

“支那学”通过贬低中国历史文化而彰显日本的优越感，从而确立日本的亚洲中心地位，这种主张或目标在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而日本东洋史学又包含了更明显的政治诉求。笔者认为，历史文化研究追随国家政策的步伐，是日本东洋史学的重要特征。这在日本有关“满蒙”的研究中尤为明显。在日本东洋史学学科缔造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中，中国被分成了“支那本部”“满洲”“蒙古”“新疆”等不同部分。我们惊诧于这种赤裸分割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同时也看到，上述划分正是日本东洋史学研究的重点，而“满洲中立论”“南北二元对抗论”等充满政治企图的论调，因为东洋史学的师承性质等，充斥于日本东洋史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之中。笔者认可学术研究的上层建筑性质，也充分肯定历史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二者从来不是点对点的关系，不应该是对历史现实的偏视甚至罔顾。

“开港”“倒幕”“废藩”，十九世纪日本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下，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汉学思想主导地位受到极大冲击。在“文明史学”的众生喧嚣中，批判、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支那学”走上历史舞台，这种对中国的认知立场，因京都帝国大学而著称，实则贯穿了明治到二战结束前日本汉学研究的始终。而作为此一时期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显学的日本东洋史学，建立的基础是以政策为主导的学科建设，剥离分解原有教育体制中的汉学元素；运行的动力来源于现代学术研究框架的支撑，以及日本文化优越论与中心论的确立；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开展的具体研究，在“支那学”批判的基础上，紧密配合了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使这一体系的汉学研究走入了歧途。

（赵薇：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② 滨寺纮一：《东洋学事始》，第198页。

③ 津田左右吉：《在日本支那学的使命》，金井修编：《津田左右吉论集》，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第192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rticles, the author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 Study of the Tang-Song Poetry Views of the Literati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Piao Zhexi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separately set off a discussion about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in the Korean poetry world. In general, the literati's understanding and choice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was not absolutely "worshipping Tang" or "worshipping Song", but often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Tang and Song learning and their blending, with Tang and Song poetry as the highest, which the literati had to emulat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stud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ang style and Song rhyme was deepened, and they proposed to use *qi* to distinguish Tang and Song poetry, and their poems and essays also showed different creative tendencies. Lat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schools of Song learning, such as Haidong Jiangxi Poetic School, and the pioneers of Tang learning such as Nam Hyo-won, Kim Seok-hsi, Kim Jong, and Lee Hoo and others, a change of the Korean literati's attitude towards Tang and Song poetry gradually took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and disputes about whether to "learn from the Tang poetry" or "learn from the Song poetr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l formation of the "Tang and Song Poetry Dispute" in the middle of the Joseon Dynasty.

Key words: early Joseon Dynasty, learning from the Tang poetry, learning from the Song poetry, Tang and Song Poetry Dispute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iental Historiography and Japanese Sinology

Zhao Wei

Abstract: Japanese Oriental historiography is not Japanese Sinology or a na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 Japa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fter the Meiji period, which the Japanese academy has endeavored to assimilate into the system of Oriental studies, actually contains at least two threads: "Oriental studies" and "Chinese studies." Oriental historiography is the main element of the Oriental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scholarly societies, journals and schools, Japanese Oriental historiography is a brand-new system of observation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 in terms of supporting framework, discussion methods and research stances. As for its "criticism"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 Japanese Oriental historiography is consistent with "Sinology", covering definite cultural and even political claims.

Key words: Oriental historiography, Japanese Sinology, Sinology

A Study of the Source of *Bian Zhengjiao Zhen Chuan Shilu* Written by Juan Cobo

Zhou Xuan

Abstract: *Bian Zhengjiao Zhen Chuan Shilu* (the true tradition of the apostolic faith), a catechism specially for overseas Chinese living in the Philippines, was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Spanish Dominican missionary Juan Cobo who had travelled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and finally arrived in Manila in May 1588. This work records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a Western missionary, but it was ignored due to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the author when he was on a mission to Japan.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the source of the book, discussing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